

社会发展与治理研究



“制造景观”还是“创造生活”： 一个乡村空间生产的案例分析

赵晓峰, 符郁松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人文社会发展学院, 陕西 杨凌 712100)

摘要: 空间生产方式与乡村社会基础的契合性决定空间更新的实际成效。前者更关注生产空间的交换价值, 主张将乡村空间资源尽可能景观化, 使之成为旅游市场中的消费品, 以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 后者更强调生产空间的使用价值, 注重贴合在地村民生产生活需求和村庄的长远发展利益。进一步进行“过程性”“关系性”和“情境性”分析, 发现由政府和企业主导的前者, 其经济效益和可持续性很难达到预期成效; 由政府、社会组织、在地生活者以及其他主体共同参与的后者更契合乡村社会基础, 并形成了一个多元的新社会空间。如将“制造景观”理解为“外源式”空间生产, 而“创造生活”则属于“内生型”空间生产, 其能自内激活乡村的生命力, 在实现乡村空间使用价值最大化的同时, 也能更好地满足乡村旅游的消费需求, 进而形成新的生活、生产和消费的社会共同体。

关键词: 乡村空间; 空间生产; 乡村振兴; 乡村生活

中图分类号: G912.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283(2024)02-0123-12

收稿日期: 2023-10-26

DOI: 10.15983/j.cnki.sxss.2024.0310

基金项目: 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建设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研究”(22ZDA101)

作者简介: 赵晓峰, 男, 河南新野人, 法学博士,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

一、引言

中国式乡村现代化是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 客观上要求合理组织和优化配置乡村空间资源, 形成一种新的空间生产形式, 以调和城乡空间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和乡村空间的发展不充分, 推动乡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的全面高质量发展。因此, 我们对乡村空间的关注须从空间中的生产性要素配置及其组织方式转向乡村空间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强调以人为本的空间生产^[1]。

乡村空间及空间生产作为理解乡村的重要视角, 对乡村社会的演变有特定的解释力和影响力。

乡村空间是乡村社会存在的广延性场所,是乡村建设与发展的先在性前提。同时,乡村空间也是乡村社会的表现,是乡村社会历史地生产着的具有一定整体性和特殊性的“产品”。“乡村空间生产”是嵌入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现代化所形成的独特空间模式。从理论上来说,社会主导的生产方式总体上决定着乡村空间生产的基本形式,而乡村空间生产形式又进一步影响着社会的生产与再生产。但实际上,具体的乡村空间经验中存在着更复杂微妙的问题。

通过实地调研福建、天津和陕西等地区乡村空间的更新情况发现,当下乡村中广泛存在着“制造景观”和“创造生活”两种空间生产的思路和取向,其背后是乡村建设的不同逻辑和策略。相对而言,前者的实际成效有限,而后者却形成了良性发展循环。本文认为乡村空间更新方式对乡村发展质量有重要影响,进而言之,空间生产方式与乡村社会基础的契合性决定着空间更新的实际成效。因此,对于是“制造景观”还是“创造生活”这一问题的考察,关乎如何形成一种更符合乡村社会现实的空间生产形式。这一问题不仅是一个理论命题,更是一个经验命题^[2]。本文将悬置理论先见,返回乡村空间这一特定的、具体的经验领域,以“过程性”“关系性”和“情境性”3个分析维度把握东角村这一典型案例的空间经验背后的生活性、社会性与历史性脉络,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对上述问题的讨论。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框架

悬置乡村空间经验研究的理论先见,并不意味着不关注理论。相反,只有在深刻认识理论及其限度的同时,才能更好地从乡村空间经验出发理解乡村社会存在的基本规定性和乡村社会变化的总体可能性,进而把握空间更新方式与乡村发展质量的关系的实质内容。因此,在对既有乡村空间研究的回顾中需要把握经验和理论两个层面的内容,形成对既有解释体系的批判性认识,进而建立相对更贴合乡村空间现实的分析框架。

(一) 对空间更新与乡村发展的解释及限度

随着城市化的急速推进,现代社会的空间生产阵地已经从都市领域扩张到乡村领域,高发于都市的空间现象在进入乡村后显露出更复杂的面向。将乡村空间纳入中国现代化、城市化、城乡融合等社会进程语境中加以理解是既有研究的一个基本共识,其中关于乡村空间更新方式或乡村空间生产形式与乡村发展的认识可以概分为3类:

第一类是空间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地理学视域中的乡村空间研究。其将乡村空间视作一种可统筹、分配和优化的资源,而与之相应的空间生产则是一套服务于增长(尤其是经济增长)的技术和策略。伴随着乡村空间不断卷入城市化、工业化与市场化等进程,地方政府主导与市场合力^[3-4]基于经济增长的逻辑和需求进行乡村空间重构,其中最为典型的是通过综合整治农村土地、集中安置农民居住地等方式增加城乡建设用地以推行、维持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5-6],而土地流入城镇房地产、制造业或旅游业等又进一步塑造了城乡空间形态和社会关系^{[7],[8]}。这样的空间重构服务于城乡建设的效益最大化的逻辑,属于空间规划与经济发展“互嵌”的乡村空间生产模式^[9]。经济发展的逻辑将乡村空间纳入“生产—消费”体系,空间规划的逻辑则是在空间中建立新的秩序与规范体系,两者共同加剧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空间资源的错配与非均衡现状^[10]。因此,在宏观上要重新审视发展与平衡之间的关系问题,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空间方案和空间路径^[11],相对围观的是关注主体间的非均衡博弈机制^[12],寻求乡村空间再生产的权能关系及其实现的正式与非正式路径^[13]。

第二类是从空间视角探讨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以实现乡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的研究。其将空间

理解为实现特定的社会治理技艺的“场所”或策略。这类研究在关注乡村以及城乡之间的空间实践、空间形态与社会关系的制度性根源与非制度性要素的基础上,探讨如何塑造乡村社会秩序、公共性或新共同体的问题。^{[3][14-15]}将乡村看作是特定的社会总体或实体进行“营造”,而“营造”的基本逻辑则是以乡村空间再造实现乡村治理共同体再造。^[16-17]乡村空间再造实践被归为一种“五面四层一体”的结构模式:“五面”是指从“人、文、地、产、景”5个维度对乡村空间进行观测与评估;“四层”指的是以人地关系作为元级,物质空间、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作为衍生级,衍生级之间存在着阶段性的优先关系;“一体”指的是将乡村空间作为整体,从“五面”和“四层”上进行综合分析并提出一体化的营造策略,而具体的营造策略围绕“物质生产—社会治理—精神文明”三重维度展开对乡村空间资源与权利的配置和优化。^[18]

第三类则是在整理乡村空间与推动乡村社会有效治理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如何以空间重构、推动新的社会共同体或新公共性的形成。这类研究着重关注公共领域内物质空间和文化空间的更新。如优化人居环境、重建休闲场所、组织集体活动等,以及在私人生活的边界和空间结构已经形成^[19-20]的当下通过“虚拟公共空间”营造新的联结形式^[21],而这类公共空间塑造的社会生活的首要特征在于“生活性”而非“政治性”或其他^[22]。也就是说,在乡村生产新的公共性或者建立新的社会共同体的关键在于正确把握其与社会生活的“生活性”的辩证关系,建立新的生活共同体。既有研究大多强调“本地人”和“地方社会”的空间更新,以及外来者“入侵”对在地者主体性的消解和对空间的支配^[23],而随着乡村研究的基本范式从“城乡二元结构”转向“城乡一体化”,乡村生活共同体和生活空间应该被赋予更加丰富、包容的内涵,“本地人”与“外地人”的关系需要重新考量。

上述3类研究从不同阶段、层面和维度呈现了既有研究对空间更新与乡村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并讨论了乡村空间更新或重构的方式影响着乡村发展质量的政治、经济机制和社会治理机制以及相应实践逻辑和策略。总体来看,这些研究在内容上经历了从国家视角到地方社会视角的转变,从强调对乡村空间资源的控制与配置到重视乡村空间的社会治理功能的实现。在方法上则逐渐形成一种乡村社会结构分析与乡村社会过程分析相结合的模式,即将以经济—政治为中心的乡村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与共时性制度或非制度性要素结合起来,把乡村发展想象和理解为一个统一的问题和辩证的过程,以此展现乡村社会变迁与空间生产的基本规定性。这些研究为我们理解乡村与乡村空间生产提供了最基本的支持。

随着乡村空间现实的不断变化,既有研究力所未及之处也逐渐显露。其一是结构性分析无法回避其本身存在的“结构上的不可见性”^[24],尤其是倾向于总体的乡村社会过程和乡村社会结构分析容易忽略乡村是一个特定的、实在的社会范畴,乡村空间生产有着丰富、多变而具体的内容。其二是在理解以乡村空间重构推动乡村社会共同体再造的路径时,大多是从一种外部的、不在场的或“想象的内部”视角展开,以一种具体的空间认识论的逻辑取代了乡村空间生产的实践逻辑,而实践逻辑是多向交互的。其三是对“新的乡村社会共同体”的理解有待丰富。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当下的乡村已经不仅仅是“村民”的乡村,它是一个混合着“本地人”与“外地人”,“在场”与“不在场”的多元社会空间。乡村空间作为一个经验领域,可能比我们所认为的更加深刻、复杂而富有改变的力量。

(二) 返回乡村空间经验的路径

如何返回乡村空间这一特定的经验领域?换句话说,如何回到事情本身?除从实证主义立场对社会空间进行基于实在性与客观性的结构化思考外,现象学指出实证研究中的空间观念不能等同于

日常生活实际存在的经验空间。现象学提倡的是一种存在论的立场,即以“回到事情本身”扭转存在与存在者的关系,恢复存在对于存在者的优先地位。^[25]“存在者”是我们“目光”所及的“对象”,“存在”则是使存在者得以显现的背景和过程,也就是现象学语境中的“境域”。在此意义上,现象学的空间是境域化的空间——不再是抽象的、独立的存在形式,其内在地关联着情境、行动、体验和意义等具体内容。相较于社会学传统中的实证立场,将空间经验当作可以直接观察和研究对象,现象学认为空间首先以知觉的方式呈现在我们的观念中,需要先理解特定知觉的内容与形式才能真正理解空间经验。^[26]

“境域”是理解知觉的内容与形式的关键概念,也是联通知觉世界与社会世界的桥梁。本文将境域理解为具体的乡村空间经验中存在的总体,并将过程性、关系性与情境性作为空间经验的基本分析维度。从宏观的空间理论进入具体乡村空间经验时,可以通过过程性、关系性与情境性(或者场景)等关键概念建构对现象的分析逻辑。^{[3][27-28]}过程性分析是把研究对象放在乡村空间更替的过程中,将在城镇化、工业化与现代化的社会进程中出现的新的空间要素纳入乡村形成的社会变迁链条,并作为理解乡村社会的时间路径;关系性分析是将空间视作由社会关系构成的互动场域,通过研究乡村空间中的共存者之间的关系结构来呈现乡村社会的整体图景;情境性维度则是呈现处于过程与关系中的研究对象的实质内容的方式,关注主体及其行动,强调微观的互动形成的情境化联结。^[29-30]在特定的乡村空间经验中,这3个维度相结合的分析方式可以很好地呈现具体的空间更新过程,展示不同主体和不同路径的空间实践所包含的行动、事件与体验等流动的与具体的内容,进而有助于把握乡村空间生产的生活性、社会性与历史性脉络。如果说趋向结构化的社会分析是自上而下、自外而内的理解乡村社会,那么回到具体的经验则侧重于自下而上、自内而外的理解乡村社会。

本文将依据这一框架来阐释一个村庄的空间经验:首先呈现该村空间生产的境域,即其“制造景观”与“创造生活”两种空间生产路径的总体过程、条件与背景,在此基础上以过程性、关系性和情境性3个维度分析与乡村社会相契合的特定空间经验的生活性、社会性与历史性脉络,把握空间生产的社会基础所在,进而探讨如何形成一种契合乡村社会基础的空间生产形式,以增进乡村空间更新的建设成效。文中所用经验材料主要来自笔者自2019年8月至2023年8月期间两次实地调研、多次线上线下访谈、检索官方网站公示材料,以及其他各方的工作记录与工作总结等。通过这些资料的相互印证,笔者借助追踪分析的方法将经验材料放置于其发生的时间序列和互动情境中考察其在逻辑上的合理性和情境中的相关性,从而对该村的空间过程形成了比较整体和可信的认识。

三、回到经验:东角村的空间生产

东角村位于福建省福鼎市嵵山岛^①(大嵵山)的东南角,与鸳鸯岛隔海相望。交通以每天定时的渡船和环岛公交车为主。^②全村在籍人口1538人,约400人常年在村,以老人(65岁以上占50%,70岁以上占35%)和妇女为主。2012年,嵵山岛被列入《福建省现代海洋服务业发展规划》,依据嵵山岛

^① 嵵山岛,由大嵵山、小嵵山和鸳鸯岛等多个岛屿组成(又称“福瑶列岛”)。大嵵山上有淡水湖和草原,旅游资源丰富。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设“嵵山游”,清代作为海防门户,明清之际因渡口和码头而贸易兴盛。新中国成立后,当地有过一段时间的商贸繁荣,但随着海洋渔业的发展,渔船体量的增加、渔船续航能力的增强和新码头的建设等原因,当地码头被废弃而转衰(参考福鼎市文体和旅游局提供的资料)。

^② 渡船每天两班(上午9:00,下午2:00),环岛公交车每小时一班(早上6:00到晚上8:00)。

的资源禀赋将其定位为依托“山、湖、草、海、岛”等景观打造以“岛国天山”为主题的海岛生态旅游基地。按照这一定位,福鼎市政府制定了《福鼎市嵛山岛旅游发展规划(2017)》《嵛山岛全域生态休闲旅游小镇项目(2023)》等规划嵛山岛及东角村空间开发的基本方向,对实际的空间开发与景区建设起到了具体的指导、规范与修正的作用。由此,嵛山岛及东角村拉开了空间更新的序幕。

2017年10月,福鼎市政府、太姥山风景名胜管理委员会与祥源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①共同签订了全域旅游目的地战略合作协议。其主要内容是祥源集团在福鼎市成立“太姥山祥源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代表三方进行太姥山风景名胜区、福瑶列岛(嵛山岛)景区以及周边海域旅游等开发和经营工作。其中针对福瑶列岛(嵛山岛)景区综合开发项目,成立“太姥山祥源嵛山岛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暂定名)”负责具体开发和经营事务。^②

截至2021年,这套班子在嵛山岛景区主要做了3件事:其一是对嵛山岛“海上天湖”“桃花谷露营地”等景点进行规整与管理,制造情人桥、观景台等网红打卡点,并对这些景点的部分基础设施进行更新,还设置了景区管理员;其二是统一游客进入嵛山岛的交通方式和游览路线,在码头设置游客集散中心,用环岛公交车取缔私家车,吸纳部分岛民成为专职司机和导游;其三是通过图文与视频的形式,在各大媒介平台营销和推广嵛山岛景区。这些工作将嵛山岛打造成了一个比较规范又略显粗糙的网红景区,短暂吸引了东南沿海地区的部分游客,获得了相应的旅游业红利。但从长期来看,景区经营并没有形成良性循环,反而埋下了更深的隐患。

在嵛山岛景区开发改变整体空间结构、影响社会关系的同时,另一条从村庄内部进行空间更新的路径也逐渐成形。2018年2月,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师生团队在嵛山岛进行实地调研,通过与当地政府负责人进行交流、入户了解村民的想法,提出了初步的整体性规划。其中,依据东角村的村貌形态和各类资源、村民关于发展经济产业和满足生活需求的现实情况,并结合东角村发展休闲旅游的定位,提出对村庄街道、村部立面、海岸立面、观景平台、民俗和废弃场地进行实体改造和美化。这一总体方案得到了福鼎市及嵛山镇政府相关部门、东角村村两委及村民代表的认可,并在后期的深化调研和落地过程不断修正和完善。2018年5月,清华大学与福鼎市正式签约成立乡村振兴工作站(福鼎站),达成工作站制定乡村空间改造方案,地方政府提供资费(招商引资和专项资金),共同开展嵛山岛乡村振兴工作的协定。工作站设置了三站长制度:校方站长由受访者01-Z担任,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乡规划专业在读博士,负责组织高校资源助力地方发展;地方站长为受访者02-L,是嵛山镇政府工作人员,负责项目的日常运营以及地方资源的整合;校友站长则负责联动地方周边资源。工作站成员由各高校各专业的师生组成,包括但不限于建筑学、景观设计、社会科学等专业背景百余人部分参与或长期参与嵛山岛的乡村建设工作。

自2018年2月至2023年8月,该团队已完成将废弃鱼露仓库改造为“乡村振兴大礼堂”,将废弃

^① 根据福鼎市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fuding.gov.cn/zwgk/bsyw/201709/t20170926_668009.htm)所提供的信息,祥源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以构建“旅游目的地”为战略目标,业务跨涉文化旅游、城市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等多领域的综合型控股集团。

^② 这一经营主体的注册资本1亿元。其股权结构为太姥山祥源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以现金出资占股51%、该公司以其拥有的福瑶列岛(嵛山岛)景区独家经营权作价入股占20%、嵛山岛景区净资产与双方认可的景区合作范围内其他经营性资产及现金出资占股29%。溯源太姥山祥源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的三大股权方分别是福鼎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由福鼎市人民政府经济研究中心100%控股),祥源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太姥山管理委员会(福建省属事业单位)。

小学改造为乡村振兴工作站,重建村内公共卫生间,新建村内小花园,改造村民家庭民宿,筹建渔村文化展览馆,参与筹备海岛音乐节等项目,且在更新空间的过程中兼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在建造实体空间的同时,该团队也通过“共生效应”助推社会空间的更新,即在与当地村民同吃、同住、同生产的过程中成为“当地人”,以当地人的身份站在当地村民的立场为当地谋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与生态五方面的可持续发展。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倡导团队作为第三方参与基层治理,帮助搭建干群沟通桥梁,解决乡村发展和村民在生产与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笔者通过梳理东角村空间变化的过程,发现这一过程中存在着两种几乎同时发生的空间生产路径。前者是由福鼎市政府主导并协同外来企业和景区管辖单位,形成三方共同推动的将乡村空间资源景观化的路径,即将乡村空间资源作为旅游景观被生产和再生产出来。这可以概括为“制造景观”的空间生产。后者是由乡村振兴工作站(福鼎站)主导方案的实施,当地政府提供资金和落地支持,广泛带动在地村民、外来经营者以及其他相关主体共同参与,从村庄内部贴合在地者的生活实际和乡村发展需求进行空间更新,真正激活了乡村社会的生命力。这可以概括为“创造生活”的空间生产。

四、“制造景观”还是“创造生活”

(一)“制造景观”的空间生产

发展乡村旅游业被视作实现乡村发展的可行途径之一:通过将乡村独特的自然景观、人文资源作为发展产业的基础激活其他乡村资源;以游客消费促进村民就业创业,提高村集体和村民的收入,形成生产与消费的区域链条;以景区建设带动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实体空间更新和生态环境优化。

在当下乡村社会中其实广泛存在着以“制造景观”为主要实现方式的空间运作机制,按照其资源禀赋的不同可以大概分为两类:一类是缺乏发展旅游业相关资源的村庄,盲目跟风式的生搬硬造景观。例如陕西汉中地区的某个村庄本身没有旅游资源,也缺乏区位优势,尝试借助红色故事打造红色旅游村,投入了较多资金,但取得的成果十分有限,只能凭借党政机关参观学习等名目勉强支撑。这一类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内,这里仅指出这种现象及其影响。另一类是具备发展旅游业基础条件的村庄。例如笔者曾实地调研过的天津市宝坻区刘家牌镇诸村依托毗邻京津冀特大城市周边的区位优势 and 稻田、林木、水系等丰富的生态资源,打造“水木三乡”生态休闲旅游小镇,此外还有本文详细介绍的东角村。这些村庄拥有的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区位优势等禀赋使其可以通过发展旅游产业实现乡村的发展,但实际却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景区运营没有形成良性循环。

这一方面是旅游产业本身经营不善的问题,如福瑶列岛(崂山岛)景区综合开发项目在实际的运行中成为太姥山风景名胜区开发和经营项目的附庸。崂山镇政府和崂山岛的其他经营主体受制于代表三方的太姥山祥源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的总体规划和资源分配,缺乏自主开发和运营的权能,因而形成了崂山岛景区后续乏力、无法回本甚至难以维持运营的局面。

另一方面则是旅游产业发展的逻辑与村庄发展的现实耦合度可能没有理论上那么高,其背后是乡村空间作为“实体”的实践逻辑和作为“景观”的表象与主体之间的供需逻辑的现实差异。^[31]这一现实差异尤其体现为崂山岛景区的开发对东角村以本地村民为主的在地者的日常生活与生计经营的双重影响。部分人以征地补偿、就业安置的形式享受到开发初期的红利,但更长远存在的是因开发不当和经营不善所导致的广泛的负面影响。当地村民普遍反应天湖开发后水质变差,按管道分区域采集8户水样的比对结果也证明了这一说法。2018年,旅游公司统一环岛旅游路线和交通方式后,改变了部

分以带客为业的村民的生计经营方式,而更重要的是因为公交车定点定时影响了村民的日常出行。这些问题并没有明确的解决方案,只能通过当地政府和村委的调解暂时形成和解。随着福瑶列岛(崂山岛)景区综合开发项目的搁置,遗留的问题也不了了之。

(二) “创造生活”的空间生产

“创造生活”的空间生产是指向乡村社会生活的主体、需求、行动与意义而展开的自内而外的空间更新。前文已说明这一空间生产路径的概况,此处着重以东角村“乡村振兴大礼堂”为例进行分析来理解这一路径的具体内容。礼堂空间自 2018 年 7 月至今的生产过程可以概括为设计、建造和使用 3 个阶段。基层治理者(村委、驻村干部、乡镇政府部门负责人)、工作站团队、外来企业和当地村民是深度参与其中的四大主体。

空间设计与特定生产关系关联的空间逻辑是^[32]:一方面是特定权力、知识对空间的解释、构想与编码,另一方面是主体对空间的需求、想象和欲望的表达。设计方案受到主体之间的多层级交互关系和需求的影响;乡镇政府和村委从乡村振兴的战略高度将其视作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五位一体的实现,而在地村民的空间需求则具体到“打麻将和闲聊,希望有聚在一起的空间”(05-W)。工作站的设计团队综合三方诉求,并多次征求村民意见,提出建造“以乡村振兴为主题,兼具观影、喝茶和聊天等日常生活功能的村民活动的综合性公共空间”。礼堂作为宏大战略实现的同时,又重申了空间的使用功能,为日常生活的伸展和创造留白。

空间建造是贯穿乡村大礼堂实体空间生产与再生产过程的物质性活动,是多主体的实践活动。以崂山镇政府和东角村村委为主的基层治理者把控着建造的整体走向和节奏,专业团队担当指导和监督的角色,但他们对于施工的进度和节奏以及施工过程中的规范问题的应对相对被动。村民们从围观到主动参与建造,如对栏杆安置的位置提出建议、帮助垦土和清理石块、询问改造的进度和细节、捐赠家中闲置的渔网挂袋和土窑瓦罐做陈列品等。在建造过程中形成了一套社会关系和秩序结构:基层治理者与专业团队之间是主导与辅助的关系,基层治理者与施工方之间是支配与服从的关系,专业团队与施工方之间是引导与从属的关系。村民则是在开放的态度下渐进地参与和融入其中,以特定方式参与礼堂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生活的意义表达。

空间使用是不同类型的使用者体验与反馈的过程,其中蕴含着对既定的和正在生成的空间关系的复杂重构。据管理员(08-Y)提供的使用记录,现阶段礼堂主要有 3 种用途:一是村民傍晚会聚集到礼堂及其南面坡地改造的小花园处闲聊,在特定时间进入礼堂观影等;二是用作村集体议事和活动场所以及接待周边单位参观考察,彰显礼堂作为乡村振兴的象征意义,也昭示着一套乡村建设的具体策略和技术;三是作为东角村旅游的标志性景点,礼堂营造了游客和返乡者对东角村的文化体验。^①空间作为事件发生、关系生成和记忆留存的媒介,当人们置身其中形成一种“体感”串联起人的体验、意识和记忆^[33],而特定情景的交汇孕育着相应的社会关系。

设计是对交互的空间构想,建造是对集中的空间实践,使用则是对异质的空间体感,而政府、工作站团队、企业、基层治理者、村民甚至游客,都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方式参与其中。在确立以乡村空间作为生活的资料和对象的基本属性的前提下,不同主体的空间实践共同推动着新的乡村空间的形成。新的乡村空间不仅是实体空间的更新,更是社会空间的更新。而社会空间的更新意味着新的社会基

^① 使用记录由受访者 08-Y 提供。

础正在生成——新的乡村不仅仅是“村民”生产生活的家园,它正在变成一个城乡融合背景下“本地人”与“外地人”“在场”与“不在场”等要素相互交织的多元社会空间或社会共同体。乡村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础正处于一个多要素相互建构的状态。当然,这一互构关系的权力结构不容忽视,乡村和村民需要更多的关注和权能。但本文强调的是在隐含着“对立与对抗”的空间关系^[34]之外,乡村空间生产正面临着“共时的抉择”。“共时的抉择”意指的不是某种基于否定性的超越式发展,而是一种以辩证法为基础的内在批判式的进步,即乡村社会基础本身持续发生的更新。

(三) 乡村空间生产的社会基础

如何形成一种与乡村社会基础相契合的空间生产形式?东角村“创造生活”的空间生产路径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其以贴近在地生活和本土发展的空间更新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空间。这个新的社会空间向我们展示了当下乡村社会正在发生的多元社会组织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可能性。选取这个社会空间的典型案例——东角村的“乡村振兴”大礼堂,对其设计、建造和使用进行解读,以过程性、关系性与情境性提取这些空间经验背后变动的与稳定的社会基础,可以窥见乡村社会的生活性、社会性和历史性脉络。

过程性分析将具体的空间经验放入乡村空间更替的时间序列。从东角村的情况来看,乡村空间生产同时处于两个时间进程之中:一是它所嵌入的外部时间进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乡村现代化的时代任务要求乡村空间生产作为总体性目标的具体内容的实现。这意味着东角村的空间更替要跟上总体的步伐与节奏,并且要在政策要求下尽可能地做出相对先进的探索和试验。二是它自身拥有的内部时间进程。当地的生产与生活节奏不具备强烈的发展(尤其是关于经济发展的宏大叙事)取向,其空间需求更偏向地方社会日常生活的实用性取向,这是基于其社会基础和资源禀赋而形成的空间更新的时间线。换句话说,乡村空间生产被卷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国家与地方的双重演进逻辑,而这两者之间并不是完全适配的,因此乡村空间生产可能形成不同路径。

关系性分析将具体的空间经验纳入社会关系构成的“互动场域”。社会关系作为一种结构机制形塑着空间经验,并随着空间实践中主体互动的展开而不断更新。空间更新的过程显现了各主体之间辩证的协作关系——他们以合作与制衡的方式确保乡村空间生产的系统性与可持续性,同时各主体之间存在的结构性矛盾也加剧着乡村空间生产的复杂性。与此同时,“创造生活”的空间生产实际上起到了调和结构性矛盾的作用。这样的空间实践打破了原有的分割、隔绝状态,融合与共生的空间昭示着新的社会关系逐渐形成:在“外地人”(工作站团队)与本地人、“城里人(游客)”与农村人、基层治理者与基层人等不同群体或角色之间生成新的社会关系,而且新的关系不仅发生在人与人或主体与主体之间,也体现在人与物之间,人与观念、精神之间。

过程性分析与关系性分析显示了乡村社会作为一个特定经验范畴与现代社会这一总体范畴的联接。情境性分析则是更具体地定位和呈现研究对象的过程与关系维度的内容的方式^[35]。情境围绕主体的“工具箱”与主体的行动展开,强调微观的互动与参与^[30]。回到乡村空间生产的某些具体的情境中,例如村民与工作站成员交流改建自家民宿的方案,返乡探亲的人向朋友分享家乡的变化与机遇,游客在村庄中穿行、老人在门口晒太阳与儿童在海岸边游戏等片段织就了一幅和谐的渔村图景。透过这些情境,“创造生活”的空间生产并没有遵循某种特定的空间逻辑,它是开放的、实践的和包容的,可以表达和满足不同主体的需求,生成不同的体验和记忆。它似乎正在生成一套完整的在地空间秩序,一些结构性因素所隐含的矛盾在具体的事件和行动中得到化解。

综合过程性、关系性和情境性分析来看,一种新的空间形态和新的社会关系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参与其中的人们正在建立新的生活、生产与消费的共同体。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中将共同体视作建立在参与者本能偏好的、习惯制约的或与思想相关的共同记忆、感受或文化的基础上的联合体。换言之,共同体在最基本的意义上是一种生活形态或习惯。人们首先生活在一起。这种生活更多强调的是一种关联或关系,它不完全取决于实际在场与否。东角村正在发生的日常生活无疑是新的共同体正在形成的生动写照。参与者在空间更新的过程中频繁互动、增进了解,孕育出共同的认识和情感,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工作站和村民之间关系的转变。如工作站成员对村庄建设和村民发展的思考不再仅仅是理性的。他们把村民当作朋友,把村庄视为第二故乡,真切地、长期地关心着村庄的命运和村民的前途。村民也在这个过程中增进了对村庄发展的认同,不再只看重个人当下的利益而把自身发展与村庄发展割裂开来,其参与公共事务和公共生活的频率与积极性逐渐增强。除此之外,村民内部也借机建立了民宿、餐饮、养殖等产业内或产业间的交流、合作机制,其中不仅有正式的商业往来,也有非正式的互相帮助,尤其是民宿行业自发形成了“新老互助”的模式。“新”是指在当地社会空间和发展生态中看到了机会的返乡青年,“老”是指在当地开家庭旅馆或小有产业的中老年人。返乡青年带着新的视野、新的审美和线上经营与宣发技术回到乡村办民宿或文创等产业,而老一辈的从业者积累了一定的资金、经营经验和人脉关系。他们建立互助模式,不仅是为了规避不良竞争和促进资源有效流通,也是出于为家乡产业做大做强的情怀。这是在总体发展中看到自我力量 and 实现自我价值的欲求、情感、意义的展现。

可见,参与者在正式的、标准的、形式化的关系之外还形成了新的非工具性的联结。特定的情感、归属和认同串联起当地的生活、生产与消费关系,并在相应的日常生活情境中生发出来,由此形成的新社会共同体不是一个由目的理性所支配的组织,其具备参与者所共同生产、赋予、认可的共同属性与自有价值。这个新的共同体蕴含着巨大的活力和可能性。这就是“创造生活”的乡村空间生产路径所独有的社会基础——特定生活世界中生成和发展的内循环。它是实践的、开放的,参与其中的人们更加关注与自身生活体验和生计经营相关的外部因素,更愿意与同一空间中的其他主体互动,更切身体会到与村庄发展息息相关的事情,因而也更有可能会主动地思考如何分享乡村发展的时代机遇并成为乡村发展的一部分。正如马克思所言,人的本质是人真正的共同体^[36],而真正的共同体一定是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统一的、个人发展与总体发展相统一的共同体。这样的社会共同体也就是社会生活本身,包括人、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活动、关系、文化与情感等多方面的内容。

当然,乡村社会的命运和前途内嵌于乡村现代化的进程中,乡村要发展必须紧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乡村现代化的时代步伐。如何实现这两者的有机结合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创造生活”的空间生产方式以其实践成效证明,以在地生活为中心的空间生产能在具体社会范畴以特定实践调和与国家与地方关于发展不同的演进逻辑,并通过形成集城乡之间、不同群体之间的生活、生产、消费于一体的新社会空间或新社会共同体把握自身发展的节奏,孕育自身建设的力量。

五、总结与思考

本文发现乡村空间更新以两种不同的空间生产路径发生:一种是“制造景观”的空间生产路径,将乡村空间资源景观化,使之成为旅游市场中的消费品,强调建立在空间交换价值之上的经济价值实现;另一种是“创造生活”的空间生产路径,围绕在地者的生活需求和村庄的发展利益改造空间,以在

地化的方式推动乡村社会全面发展。这两种不同的空间生产路径背后是不同的乡村建设逻辑和策略。前者脱胎于线性发展观的预设和城市中心主义的立场,汲取乡村空间资源将其景观化,使乡村逐渐演变成单一的、抽象的消费空间,从而丧失了乡村作为生活空间最本源的功能和意义。后者则将生活空间的重构视作振兴乡村的关键,打造居住、劳动、休闲和消费等日常活动的空间聚合体,在自内而外地实现乡村实体空间更新的同时推动了乡村社会更新,激活了乡村的生命力。

这两种空间生产路径广泛地存在于乡村空间改造或更新的过程中:“制造景观”式的空间生产不仅体现在本文所列举的东角村、赵家湾村等诸多打造乡村旅游的“布景”活动中,也体现在某些村庄过度甚至举债打造“政绩景观”以及某些村庄中村民相互攀比、争相过度建房等现象中。这些现象反映出乡村空间生产存在一种脱离其在地生活根源的抽象化、符号化的趋势。换句话说,这样一种以制造旅游景观为目的的空间生产,将地方社会简化为一种被凝视、被消费和被区隔的对象,^[37]这实际上产生的是一种社会表象,并没有形成一个在地的生活、生产与消费的社会共同体。“创造生活”式的空间生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伴随着对上述现象的反思而产生的,它既是在地村民在日常生活实践中以“空间的取用性”对“景观化空间的支配性”的抵抗,也是学术研究中“以人为核心”的乡村空间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持续思考,更是由地方政府、在地者、企业、高校或其他社会组织共同进行的乡村空间更新行动。这些行动已经在浙江、福建、天津等地的乡村生根发芽,仅由清华大学牵头的高校乡村振兴工作站就已经在全国21个省市建立了32个站点,同济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以及某些公益团体也正在着力于搭建助力乡村社会发展的平台。

“制造景观”还是“创造生活”,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关乎着如何理解和推动乡村建设的实践方案。尤其是对于具备发展旅游业资源禀赋的部分村庄,应该考虑如何实现有益的、有效的、可持续的“造景”。任何更新乡村空间或发展乡村旅游产业的总体目标都是要实现乡村的全面振兴,而乡村振兴必须是“以人为本”的振兴。这里的“人”不仅指在地生活的村民,也包括与乡村相关的其他人——游客、建设者以及治理者等,他们在乡村中的行动以及能获得的参与感、幸福感等是衡量乡村是否达到实质意义上的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也是乡村能否实现真正的振兴的关键。“创造生活”能实现乡村实体空间和旅游景观的有效更新,推动城乡之间、外地人与本地人、游客与在地者、基层治理者与基层人民等不同群体或角色之间生成新的社会关系和新的社会联结形式,进而形成集不同群体之间、城乡之间的生活、生产、消费于一体的新社会空间或新社会共同体。这个新社会共同体围绕着在地生活实践形成和展开,并成为在地生活的内在构成。在此意义上,“创造生活”的空间生产既是发展乡村的有效手段,也是乡村发展的重要目标。这一关于乡村空间更新方式与乡村发展成效问题的思考,对乡村现代化、城乡一体化发展等时代命题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参 考 文 献]

- [1] 李梁栋,吕景春. 构建新发展格局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空间路径——基于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思考[J]. 当代经济研究,2023(4).
- [2] 邹建军. 在自我经验基础上对“空间”与“地方”的科学审视——段义孚著《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中的学术视角[J]. 学术评论,2021(6).
- [3] 吴莹. 空间变革下的治理策略——“村改居”社区基层治理转型研究[J]. 社会学研究,2017(6).
- [4] 林磊. 近年来乡村空间研究回顾[J]. 北京社会科学,2021(8).
- [5] 孙秀林,周飞舟. 土地财政与分税制:一个实证解释[J]. 中国社会科学,2013(4).
- [6] 周飞舟,王绍琛. 农民上楼与资本下乡:城镇化的社会学研究[J]. 中国社会科学,2015(1).

- [7] 雷震. 空间生产视角下的当代乡村营造模式辨析[M]//中国建筑学会. 2020 中国建筑学会学术年会论文集.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20.
- [8] 刘彦随. 现代人地关系与人地系统科学[J]. 地理科学,2020(8).
- [9] 李娜. 乡村空间与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链接路径探索[J]. 城乡规划,2021(Z1).
- [10] 陆铭,李鹏飞,钟辉勇. 发展与平衡的新时代——新中国 70 年的空间政治经济学[J]. 管理世界,2019(10).
- [11] 陆铭. 城市、区域和国家发展——空间政治经济学的现在与未来[J]. 经济学,2017(4).
- [12] 陈浩,张京祥,吴启焰. 转型期城市空间再开发中非均衡博弈的透视——政治经济学的视角[J]. 城市规划学刊,2010(5).
- [13] 王维艳. 乡村社区参与景区利益分配的法理逻辑及实现路径——基于现行法律制度框架视角[J]. 旅游学刊,2015(8).
- [14] 张霁雪. 城乡结合部的社会样态与空间实践:基于 C 市东村的调查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 [15] 傅才武,李俊辰. 乡村文化空间营造:中国乡村文化治理的空间转向[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5).
- [16] 王亚星,杨安华,杜焱强. 空间再造能促进农村环境善治吗? ——基于苏北 W 村的个案研究[J]. 中国行政管理,2021(1).
- [17] 陈德顺,李开. 空间再造视野下乡村治理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基于对 M 村的调查分析[J]. 思想战线,2022(6).
- [18] 陈桂生,吴合庆. 数字赋能乡村空间治理——基于空间生产理论的解释[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5).
- [19] 阎云翔. 私人生活的变革[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 [20] 阎云翔. 从南北炕到“单元房”——黑龙江农村的住宅结构与私人空间的变化[J]. 中国乡村研究,2003(1).
- [21] 郭明. 虚拟型公共空间与乡村共同体再造[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6).
- [22] 宋靖野. “公共空间”的社会诗学——茶馆与川南的乡村生活[J]. 社会学研究,2019(3).
- [23] 田雪青,张晨明. 他乡异客:“市民下乡”背景下乡村空间重构[J]. 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5).
- [24] 谢立中. 结构—制度分析,还是过程—事件分析? ——从多元话语分析的视角看[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4).
- [25] 王昊宇. 逻各斯与现代西方哲学[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 [26] 刘少杰. 西方空间社会学理论评析[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
- [27] 项飙. 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
- [28] 陆兵哲. 社会空间的继替与共存——一个郊区村庄城镇化的社会学研究[J]. 社会学研究,2023(2).
- [29] 吴莹. 社区何以可能:芳雅家园的邻里生活[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 [30] 王晴锋. 情境互动论:戈夫曼社会学的理论范式[J]. 理论月刊,2019(1).
- [31] 仇叶. 乡村旅游的景观制造逻辑与乡村产业发展路径——基于赣南 C 县梯田景观开发的实证调研[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
- [32] 刘怀玉. 马克思主义如何研究城市问题:一种三元空间辩证法视角[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4).
- [33] 陈涛. 穿城观影:中国当代影像的空间生产与体感[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20.
- [34] 鲁宝. 重思人类的解放:列斐伏尔与马克思主义差异性空间政治学[J]. 江苏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4).
- [35] DIEHL, DAVID, et al. Toward a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Social Situation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10, 115(6).

[36] 晏扩明.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研究[M]. 重庆:重庆出版社. 2023.

[37] 谢小芹. 旅游景观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 ——基于黔东南州J村苗寨旅游开发的实证调研[J]. 中国行政管理, 2017(1).

[责任编辑 杨 军]

“Making Landscapes” or “Creating Lives” : A Case Study in Rural Spatial Production

ZHAO Xiao-feng, FU Yu-so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Northwest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Yangling 712100, Shaanxi)

Abstract: The effectiveness of spatial renewal depends on the compatibility between the spatial production method and the social foundation of the village. In Dongjiao Village, Fujian Province, two spatial production paths were identified: “making landscape” and “creating life”. One approach emphasizes the exchange value of rural spatial resources, advocating for their transformation into consumer goods for the tourism market to maximize economic benefits. The other approach prioritizes the use value of the production space, focusing on the needs of local villagers’ production and life, as well as the long-term interests of the village’s development. Further analysis of “process”, “relationship”, and “context” shows that the economic benefits and sustainability of the former, which is l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may not achieve the expected results. The latter, in which the government, social organizations, local residents, and other actors participate, is more in line with the foundation of rural society and creates a new social space of diversity. If the act of “making landscape” is considered to be a form of “exogenous” spatial production, then the act of “creating life” can be categorized as “endogenous” spatial production. If the act of “making landscape” is considered as an “exogenous” spatial production, then “creating life” can be seen as an “endogenous” spatial production. This can internally activate the vitality of the countryside, maximize the use of rural space, and better meet the consumption demands of rural tourism. As a result, a new social community of lif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can be formed.

Key Words: rural space; spatial production; rural revitalization; rural life